

特别策划 |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笔谈②

为什么要从“性别分工”视角谈女性解放

·编者按·

男性适合公领域，女性适合私领域的“性别分工”思想广泛存在于传统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各个学科维度中。性别分工思想始终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消灭分工核心意义是消灭分工的异化属性，使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全面地实现解放。

■肖巍 覃愿愿

“性别分工”通常是指社会基于性别别对男女两性所进行的不同社会角色的分配，尤其是指人类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对两性进行的劳动分工。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一直奉行“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而在西方哲学传统，甚至在一些当代哲学中，也把男性安置在公共领域，把女性置于私人领域，而且让人惊奇的是，传统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各个学科维度形成一个闭环让女性认同自己属于私人领域，生来适于从事养育儿女和家务劳动的“客观真理”，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从哪个学科出发阅读和理解自己的性别身份，都会不约而同地受到同一种“思想”教育。

性别分工思想在各个学科领域中均存在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以男女孩童游戏为例研究男女孩童的心理特征，他发现，男孩在游戏中发生争吵时会坚持原则不欢而散。而类似的事件倘若发生在女孩身上便会更改游戏规则，或者换一种别的游戏接着玩下去。这便表明，男孩是坚持原则的，因而更适合在公共领域，女孩擅长维持关系，没有原则意识，与男孩相比不那么适于公共领域。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道德教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柯尔伯格在研究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时也发现，在青少年时期，男女道德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柯尔伯格把人的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和

六个阶段，认为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文化普遍意义的个体对公正原则的认知过程，然而，“按照柯尔伯格的尺度，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首先便是妇女，妇女的判断似乎仅仅停留在他那六阶段序列的第三阶段上”。这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关怀伦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作出的评论。在她看来，柯尔伯格所称的女性道德发展落后于男性的问题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他所坚持的道德发展标准出了问题，因而便提出女性道德发展的“关怀”路线。

再说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他认为男孩和女孩在童年期都有恋母情结，但男孩由于担心父亲妒忌而被“阉割”所以放弃母亲的关系，进入父亲的公共世界。女孩由于没有这种恐惧，所以一生都会被关系束缚，更适合在私人领域，即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伦理的、心理的及教育的思维都让女性在这种不自觉中认同自己属于私人 and 关系领域的“事实”和“真理”，而违背这些规则，便会在婚恋、家庭，甚至社会中受到磨难。而且，这种性别分工思想时至今日仍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影响着人们。

性别分工思想是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因而，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指导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实践，性别分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入口和切入点。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系统论述过性别分工概念，但性别分工思想却始终始终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的重

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英国工厂制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揭示出性别分工的自然产生、发展和历史命运，以及由于性别分工导致的女性作为人的异化，指明女性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的道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分工展现的不同形态进行划分，认为分工经历了从“偶然”到“必然”、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变历程。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也指出：两性之间的分工一开始是自然产生的，男性负责“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女性则负责“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由于部落所有制时期的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所以社会的运行都是建立在共产制家庭经济的基础之上。男性和女性虽然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劳动分工是基于各自的生理、体力特征自然产生的，男女两性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以及自己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

然而，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完全改变。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之前，女性并没有广泛地参与社会化大生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充当着“二等劳动力”与“劳动力后备军”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还依旧扮演着传统角色，受到

父权制和私有制的双重压迫。在家庭中，丈夫可以占有和支配妻子的家务劳动，而且两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他们在政治、道德、法律、婚姻和家庭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不平等。

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男女两性从本质上都遭遇到人类本质异化，但由于性别分工的存在，女性不仅在家庭中遭受父权统治，在公共社会生产中也承受着资本的再次压榨，无论是社会劳动还是家庭劳动都无法让女性获得肯定和自我肯定，劳动对于女性而言便是外化的和异化的，女性作为人的类本质也发生异化。尽管性别分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但只要私有制和父权制存在，女性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便无从谈起，因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真正谜底”。既然分工与私有制本是同一件事情和同一个过程，而让女性受到私有制和父权制双重压迫的性别分工也使女性作为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显然消除异化、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和父权制才能使女性获得解放，使人类获得解放，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本质便是人向人自身的回归。

消灭性别分工的核心是消灭分工的异化属性

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性别分工”思想时，人们难免会产生一些困惑，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分工导致异化劳动和人的本质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化性别分工带来对于女性的剥削压迫，共产主义社会也必然

需要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分工，那么性别分工是否也必须随之消灭？然而，男女两性毕竟存在与生俱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女性解放、人的解放要无视这种差别了吗？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和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与女性主义哲学是否应当追求消灭“性别差异”一样易于使人陷入理论误区。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消灭分工（性别分工）核心意义是消灭分工的异化属性，使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全面地实现解放。当一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可以做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思考时，也就无所谓分工和性别分工，因为他或她作为自由人已经不再为资本左右和受制各种压迫和束缚，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出人的价值和本质，男女两性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生理性别从事各种自由快乐的活动。

同理，女性主义哲学追求的目标也不是要消除男女之间生理上的性别差异，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是消除社会所塑造的性别角色中，即社会性别中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成分，不再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理论包装把女性捆绑在私人和家庭领域，让女性和社会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真理”，使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尽管女性解放和人的解放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的确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女性、为人类社会描绘的一幅值得人类代代追求的美好愿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图志 | 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实践存档

王淑贞：我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



红房子医院内的王淑贞教授雕像。

王淑贞（1899—1991），与林巧稚齐名的妇产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1899年，王淑贞出生于北京，满月后随父母移居祖籍苏州。她的祖父王颂蔚为清朝进士，祖母谢长达思想开明，主张度维足，并于1905年创办了著名的振华女校。父亲与姑母们均于年轻时留学美国，父亲王季同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数学家和电机专家。王淑贞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著名的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1907年进振华女校读书。目睹母亲因产后病症去世，王淑贞立志学医以解救妇女痛苦。19岁获得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1918—1919年，王淑贞在巴尔的摩高氏女子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两年，提早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25年，王淑贞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6年，王淑贞回国，进入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工作，创建了该院妇产科门诊和病房，1932年开始担任妇科主任。王淑贞是这所教会医院第一位担任科主任的中国人，同时她还兼任上海女子医学院的教授。任职期间，王淑贞引进国外先进医疗技术与教学方法，使该院妇产科得到快速发展，赢得了妇女的信任。1928年，王淑贞与中国整形外科创始人之一倪葆春结婚。1932年，王淑贞任上海女子医学院院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淑贞的医工工作被迫停顿，转而参加战地救护。她与医院同事设立了难民医院，收治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孕产妇与新生儿，随后又在徐家汇路建立临时医院，冒着枪林弹雨将西门妇孺医院残存的医疗设备搬到徐家汇路，使医疗工作得以正常运行。1946年，为修复被战火损毁的医院，她亲自去美国成功申请了教会拨款，次年医院恢复正常工作。

1951年，西门妇孺医院、华山医院妇产科（原上海十女医院）及中山医院妇产科合并成立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王淑贞任院长，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兼妇产科教研室主任。为了提高妇产科的医疗水平，在王淑贞的带领下，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开设了产道异常专

科门诊，以降低难产率和产科并发症；建立了内分泌专科门诊和心脏病、高血压等妊娠合并症的专科门诊，成立了妇科肿瘤病房和门诊，开展了产后流血、腹膜外剖宫产、骨盆测量、原发性输卵管癌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在王淑贞的领导和培养下，“红房子”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屋顶为红色）各专业发展迅速，人才辈出，誉满上海。

1960年，王淑贞任全国计划生育临床组的负责人，组织全国专家制定了计划生育的措施和临床科的计划，探讨有效的女性避孕方法。此外，王淑贞还接受卫生部和教育部的委托，主编了全国妇产科学的统一教材《妇产科学》。该教材于1960年出版，1977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她组织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编写了大型参考书《妇产科学理论与实践》，该书于198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另外，王淑贞还组织多个高校妇产科教授编写了《实用妇产科学》一书。她的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曾担任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中华妇产科杂志》副总编、中华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妇产科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任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1985年，她获得首届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当年同获此奖的有上一期文章中提到的苏祖斐。1987年，卫生部给王淑贞颁发了荣誉证书。

王淑贞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推进医院建设和治病救人上，放在了促进妇产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放在了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和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上。她和丈夫倪葆春均献身医学，在事业上志同道合，在生活中相互扶持，相濡以沫，曾被评为上海婚姻佳偶。

推动新时代巾帼志愿服务创新发展

随着志愿服务由“基础性社会服务”向“参与社会治理”转变，巾帼志愿者日益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大局中应进一步发挥巾帼志愿服务优势、贡献巾帼志愿服务力量，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推动新时代巾帼志愿服务创新发展。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志愿服务道路、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均具有重要意义。

·阅读提示·

■秦阿琳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群团组织进行相应创新与发展。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新时代巾帼志愿服务发展的意见》（试行）提出，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大局中进一步发挥巾帼志愿服务优势、贡献巾帼志愿服务力量，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推动新时代巾帼志愿服务创新发展。2021年7月出台的《“十四五”时期妇联事业发展规划》规定，深化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力争到2025年每个城乡社区都有巾帼志愿服务队伍或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无疑，巾帼志愿服务已成为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支柱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巾帼志愿服务的质效也迫在眉睫。

拓展巾帼志愿者的有为治理空间

目前，全国有近2400万注册巾帼志愿者、35万支巾帼志愿者队伍已成为积极的地方行动者。从其服务的重点领域来看，主要在关爱弱势群体、困境家庭帮扶、心理疏导、法律咨询与援助、家庭关系调适、环境治理、城乡文明创建等方面。

公共参与的性别机制有助于重建妇女的公共身份、拓宽其参与空间、提高其参与地位。不仅如此，从性别红利的角度来看，对既有女性人口劳动技能的利用和潜能开发，能够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更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增进社会福祉。如湖南邵阳蔡山团村的“两会三队”模式，积极引导包括巾帼志愿者队伍在内的乡村精英以组织化形式参与村庄治理，形成多方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在一些劳动力外流或老龄化严重的农村地区，巾帼志愿者在为老服务、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亦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广泛而言，巾帼志愿者的参与层次和领域仍有一个纵深推进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政策倡导将志愿服务嵌入社区治理，在顶层设计上将志愿服务发

展指标列入当地发展规划与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突破性别分工制度的影响，推动妇女志愿参与由边缘走向中心。

推进巾帼志愿者的组织化建设

从“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到“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再到“创新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新时代妇联组织改革在党的领导、基层组织建设及联系培育女性社会组织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依托六级妇联组织建立“横到边、竖到底”的巾帼志愿者组织体系，实现乡镇（街道）、城乡社区巾帼志愿服务全覆盖。在队伍“建起来”以后，关键是组织如何“活起来”，应重点解决巾帼志愿者身份认同、组织归属感、参与积极性等问题。一些地区以基层“妇女之家”为主阵地，建立以妇联执委、骨干志愿者为主导的联系制度、会商议事制度，并依托网上妇女之家、妇联执委微信群及妇联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建立了长效工作机制。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张翼认为，进一步激发志愿服务的社会治理潜力，需要尽快使志愿服务从治理体系建设阶段推进到治理结构协调阶段。如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推进区域化党建带妇建，积极发挥妇联的联动作用，打造“妇联+”的工作模式，引进巾帼志愿队伍、社会组织参与妇联工作，与公共服务部门实现阵地共建、资源共享，与其他群团组织形成合力。属地化管理的统筹与协调将巾帼志愿服务与党建、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形成了有效的志愿合作机制。

加强巾帼志愿者的专业化建设

根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2020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4100亿元，志愿者贡献服务总价值较2019年增长近八成。2022年3月5日，全国妇联在京启动“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并举行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微电影大赛暨新时代巾帼志愿服务征集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显然，志愿服务创造的

经济与社会价值正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但供需不匹配与专业性不足导致志愿服务低效发展，在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中更多是补充作用。在巾帼志愿服务中，低水平、易重复的基础型服务同样占比较大，技能型、专业型服务相对稀缺。

基于常态化、个性化和升级化的需要，巾帼志愿服务可从以下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一是建立“普适+专技”的巾帼志愿者培训制度。既涵盖相关法律法规、行为规范、组织管理等内容，又根据地方特点、群体需求、女性优势强化专业技能；二是分类开展精准服务。尤其是巾帼志愿者队伍或团体会员要在自身擅长的领域有所侧重地开展相关服务，打造特色品牌；三是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建立与专业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机制、项目化运作机制、“社工+巾帼志愿者”的协作机制。四是加强志愿服务平台的信息化建设。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巾帼志愿服务参与数据统计、资源对接、服务匹配的成效。

加大巾帼志愿者的制度保障力度

制度保障是推动巾帼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志愿服务的政策法规。建立完善以全国性立法为基础、具有地方特色的志愿服务法规政策体系，加强志愿者合法权益保障，从国家层面推进志愿服务的标准化建设与配套政策，实现对志愿服务的制度认可。

二是完善巾帼志愿服务的保障制度。各地要逐步扩大财政资金对巾帼志愿服务发展的支持规模和范围，推动更多面向妇女儿童和家庭的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畴，加强对女性组织的孵化和培育，在活动场地、活动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优先支持。如衡阳某地将乡镇、街道妇联各3万元、村（社区）妇联妇女事业发展经费各1万元纳入财政预算的做法，值得推广。

三是完善巾帼志愿服务的激励制度。通过统一的志愿者管理平台完善巾帼志愿者服务记录制度，确保服务记录的异地转移和接续；完善巾帼志愿者考核评价制度，以服务时长、星级评定等作为奖励依据，地方政府部门联合出台志愿者激励机制，以物资奖励、社会荣誉、教育培训、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积分兑换，以及将巾帼志愿者择优确定为妇联执委后备人选等多种奖励形式，激发巾帼志愿者的参与活力。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为2020年湖南省妇联智库课题《湖南省巾帼志愿服务开展现状及机制建设研究》研究成果。